

· 专栏 · 回眸 40 年，贯彻 19 大

“中国发展模式”及其经验*

刘 俏 王贵东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通过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本文将“中国发展模式”概括为：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全球化产业分工的积极参与、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以及营造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虽然中国经济面临微观基础脆弱、产业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较大、资源配置不合理、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挑战，但作为一个不断在丰富着的思想和实践探索的集成，“中国发展模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问题，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系列可以探讨的思路。

关键词：中国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 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逆向流动

中图分类号：F120 JEL: O10 P11 P52

改革开放四十年，得益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所释放的摄人心魄的力量，我们亲历了人类经济史上的伟大奇迹。一个在过去 150 年苦苦探索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再度开启“工业化”伟大征程，在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修成正果，建成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集群。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本土企业到跨国企业，从追随到引领，从点到线再到面，留下一系列可圈可点的印记。“中国发展模式”本身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的改革设计者和各个领域的践行者因循时势，不囿于陈规俗见的约束，以提升人民福祉为根本诉求，实事求是，大胆创新。这一切不但留下了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案例，也为中国破题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提供思想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中国发展模式是一个不断在丰富着的思想框架和实践集成。提炼出林林总总关于中国发展模式诠释背后的基本逻辑，上升到基本法则和规律的层面，可以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系列可以探讨的思路。

一、改革开放缔造中国奇迹

1979—201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 9.5%，超出世界 6.6 个百分点，人均 GDP 年均增速也超出世界 7.1 个百分点。2017 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8 690 美元，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是除赤道几内亚外从中低收入迈入中高收入最快的国家，

* 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批准号：71325004）的资助。

用时约 13 年。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79—2017 年中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7.3%、7.7%，再考虑到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04 个百分点，最终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高达 8.5%，与人均 GDP 增速基本持平。在脱贫方面，以 2011 年购买力平价 1.9 美元/日为贫困线，1990—2015 年中国实现了贫困发生率从 66.6% 速降到 0.7% 的奇迹，而同期世界贫困发生率仅从 35.9% 降到 10%。

政府能力迅速增强，尤其是 1994 年分税制之后。以 GDP 平减指数调整，1996—2017 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年均增长 12.8%、13.2%，高于同期 GDP 增速。财政结构方面，中央一般公共预算盈余为正，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盈余为负，中央的统筹性得以保证。中国也成为世界级基础设施建设标杆国家。截至 2017 年底，中国高铁总里程数达到了 2.8 万公里，占全球近三分之二的总里程，而中国首条高铁——京津城际高铁——仅仅在 2008 年才通车。同时，中国还保有 12.70 万公里铁路、477.35 万公里公路、12.70 万公里内河航道、748.30 万公里定期航班航线和 11.93 万公里油气管道。根据 CTBUH 全球高层建筑数据，2018 年 10 月底世界最高 100 座已建成建筑中，中国以 49 座居世界第一；未来世界最高 100 座建筑中，中国更以 51 座保持领先。

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1979—2017 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由 0.8% 提高到 12.7%，2009 年超过美国、德国成为全球最大货物出口国。中国成为全球红利的主要受益者，尤其在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中国制造也在崛起，从量变到质变。2000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并保持至今。目前，中国制造占世界的比重已超四分之一，主要产品产量稳居世界前列，2016 年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水果等农业产品和粗钢、煤、水泥、化肥等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原油产量世界第五；2017 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 13.8%，手机、微型计算机、网络通信设备、彩电等主要电子信息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应用型高新技术开始崛起，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2017 年中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超过 200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一；伴随着电商的崛起，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400.6 亿件，连续 4 年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迅猛，连续 3 年产销世界第一，并向高端市场渗透。

中国经济微观基础不断改善。1978 年之前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1978 年启动改革开放之后，创业浪潮风起云涌，20 世纪 80 年代的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鲁冠球，90 年代的陈东升、郭广昌、马明哲，以及信息时代的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刘强东、雷军等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几乎是每十年一次的创业浪潮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崛起。目前中国民营企业至少贡献了 50% 的税收、60% 的 GDP、70% 的技术创新、80% 的就业和 90% 的企业数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另外，90 年代国有大型企业也开始迅速崛起。1996—2018 年入榜《财富》世界 500 强的中国企业由 4 家增至 120 家，其中国有企业就有 83 家^①，并主要集中在提供资金、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领域。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中国的改革设计者和各个领域的践行者创造了大量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如何梳

^① 48 家由国务院国资委出资的中央企业，24 家由地方国资委出资的地方国有企业，11 家由财政部出资的泛金融企业。由于招商银行的母公司招商局集团属中央企业，所以将招商银行归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而非财政部出资企业。

理中国发展经验，总结中国发展道路并探索中国发展模式的普适性，这些问题在国内外的学界、政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学界解释

多数学者从制度创新角度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Qian 和 Roland（1998）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归结于“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他们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激励主要包括行政分权和财政分区，前者使地方政府拥有自主经济决策权，后者以财政包干为内容从而使地方政府与中央分享财政收入。周黎安（2007）从地方官员晋升切入，发现地方官员之间围绕 GDP 增长而进行的“政绩锦标赛”是理解政府激励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线索；而“政绩锦标赛”是将行政权力集中与强激励相兼容的治理政府官员模式，其运行不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巨大变化。张五常（2008）则从承包合约、县级竞争视角分析，认为中央政府拥有全国土地所有权，通过地方政府层层把土地承包给投资者并收取土地生产经营的溢价“租金”（即税率为 17%的增值税）。由于地方政府对该“租金”享有一定比例分成，所以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之间竞争非常激烈，甚至不惜以负地租吸引投资者来本县投资生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张军（2018）从土地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分析中国增长，认为 80 年代中国的改革停留在微观，1994 年分税制以后中国的改革开始走向宏观。分税制下的地方政府仅保留 25%的增值税，财政十分紧张，为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开始关注招商引资，扩大实业投资；为找米下锅，各地方政府借鉴深圳、上海土地改革试点经验，以土地出让、批租为突破口，拉开了一场积累公共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使得各地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大幅改善，财政收入显著提高，并直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蔡昉（2008）以中国人口政策、人口结构为切入，发现中国人口结构呈现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等特点，在有利的人口结构、潜在的人口红利及日益符合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下，通过二元经济式的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徐宪平（2018）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还源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准确制定和有效实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下，通过理论创新引领、集中力量办大事、摸着石头过河、基层首创与顶层设计结合、实施差别化政策、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重要方法，政府有的放矢地制定各类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年度计划，并辅以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土地、就业、投资、消费等政策全方位地服务中国经济发展。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其一般性原因，也有其特殊性原因。本文将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探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推动力量，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分析这些动能形成的原因。这样的梳理或能帮助我们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原因。

（二）中国发展模式剖析

根据 Solow 模型，经济产出可以用生产函数 $Y = AK^\alpha L^\beta$ 表示。其中， Y 、 K 、 L 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劳动； A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包括技术进步和生产组织效率的提升等。即，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劳动力和 TFP 来驱动，而中国经济增长也不例外。事实上，完整理解这三个因素推动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

资本——投资拉动。对应着 Solow 模型里中的 K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投资驱动的模式。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投资率（=资本形成总额÷GDP）与 GDP 增长率保持了较高一致性，投资率平均保持在 40%的较高水平，投资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经济体系下的中国又通过加大投资

力度，保持 43%—48% 的超高投资率，成功遏止了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此期间投资又成为中国经济免于硬着陆的重要保障。而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中国的高储蓄偏好恰好平衡了高投资。1982—2000 年中国储蓄率基本呈现高位波动状态；进入新世纪，伴随 1998 年住房制度改革推进，住房价格不断上升，居民不得不选择大额储蓄用于购置未来房产，中国储蓄率迅速拉高，一度超过 50%。^①除了相对较高的储蓄率外，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也采取了适度的金融抑制政策。在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早期资金严重缺乏时，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聚焦于将稀缺的资金聚集起来，投入国家重点扶持行业，助力产业发展。此外，积极引进外资也为中国推进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投资机会。这一期间地方政府创造性地把土地和城市的未来收益“证券化”，以房地产投资和城镇化推进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切都有助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的形成。

劳动力——人口红利。对应着 Solow 模型的 L 。中国经历 1963—1973 年、1986—1991 年两次婴儿潮后，这两批婴儿潮 16 年后转变为经济活动人口时，就直接构成了支撑中国高速发展的有效劳动力。^②中国人口红利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活动的主力人口显著增加，15—64 岁人口由 1982 年的 6.25 亿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9.98 亿人，人口占比也由 61.52% 提高到 71.80%。二是高生产效率的城镇人口显著增加，城镇人口由 1978 年的 1.72 亿人增加到 2017 年的 8.13 亿人^③，城镇化率也由 17.92% 提高到 58.52%。三是中国人民勤劳的本质特征，中国工人的每周工作小时数不仅大于美国、日本（以勤劳著称）等发达国家，也大于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

TFP——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应着 Solow 模型的 A 。虽然经济增长可以纯粹地靠增加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来驱动，但是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不佳。若使经济保持较为持久的快速增长，则需要 TFP 的不断提升。TFP 是中国人均 GDP 能够大幅提升的原因（Zilibotti, 2017），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接近 80% 的人均 GDP 增长（Brandt 和 Zhu, 2010）。根据 Penn World Table 9.0 数据，加入 WTO 之前，中国 TFP 主要为波动中缓慢增长，此期间谈不上对美国技术的追赶，甚至 2001 年中国与美国的 TFP 之比还略低于 1978 年起点值；加入 WTO 后，受益于更为开放的外部环境和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 TFP 迅速增长；随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中国 TFP 增速才有所放缓，此期间中国 TFP 基本与美国平行增长。也就是，从加入 WTO 之后到世界金融危机之前，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这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令全球惊叹的两位数增长，而 2001—2007 年的 TFP 年均增长也高达 4.7%。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 TFP 增长的原因可归纳为：一是在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产业的过程中，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迁向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这自然伴随着 TFP 的提升；二是中国发展过程中顶层设计和激发底层活力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建立现代市场体系，也带来 TFP 的提升；三是通过引进外资、积极模仿，同时通过大量的科研投入不断提升技术能力，积极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挺进。

另外，“渐进式”的改革战略和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手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局相对稳定，政策渐进式推进，各项政策始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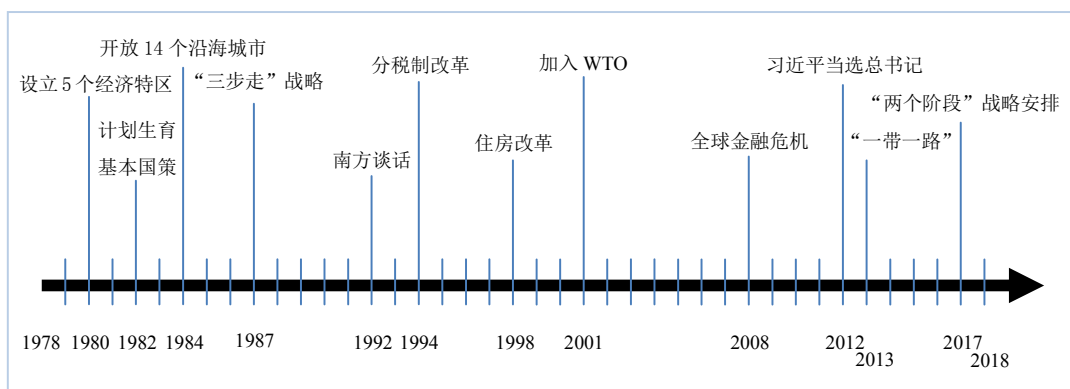
①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国家鼓励居民扩大内需，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过高的储蓄率，但仍处于不低于 45% 的超高位水平。

② 1982 年起正式实施的“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也使劳动力腾出更多时间去搞经济建设，这是因为养育一个子女的精力要小于养育多个。

③ 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迁到城市，为中国推进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中国制造和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受益于此。

保持着高度的连贯性。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1980年设立5个经济特区，1982年确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1984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7年确立“三步走”战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1994年分税制改革，1998年住房改革，2001年加入WTO，2008年经历世界金融危机，2012年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序幕，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7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战略安排……这些大事件伴随着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也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而综观美国、日本等多党制国家则不具有此政治优势，多数国家都是表现为领导换届政策也变更的双变现象，多变的政策不利于微观企业形成稳定的发展预期。

图1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

简单总结中国四十年间取得的经济成绩，四十年的思想探索和实践所汇聚形成的中国发展模式，过于粗略的线条不可避免会忽略千千万万个体的尝试、大量的细节，甚至失去总结的意义。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使得我们有必要冒着挂一漏万的风险，尝试梳理出那些最重要的第一性经验。

其一，摆脱了政府与市场简单二元对立观点的束缚，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政府通过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具体规划的执行，主导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公共产品和具有显著外部好处的活动（如教育、医疗和科研投资等），同时鼓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扮演重要乃至主导作用。以此形成的混合经济带来了持续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政府顶层设计与激发底层活力结合，合力建立一个大规模市场，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产业崛起成为可能，进而完成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其二，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中国的工业化之所以在改革开放期间取得重大进展，对外开放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是重要原因。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不仅带来早期发展急需的技术、资金和市场，也带来向价值链高端挺进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伴随着 TFP 的提升。

其三，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包括家庭承包责任制、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绩竞赛机制、采取适当金融压抑政策确保稀缺资金能够投入到重大行业和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创造性地把土地和城市的未来收益“证券化”等等。这些制度

创新带来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本，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有利于资源更有效地配置。

其四，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审慎有序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配合。2001—2017年，中国GDP平减指数年几何平均值为3.54%，低于世界0.50个百分点，中国CPI年几何平均值为2.30%，低于世界1.24个百分点。

四、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

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是值得肯定的，但其背后掩饰的结构性问题也日渐凸显，尤其是在中国技术达到世界前沿技术的25%—30%以后（Zilibotti, 2017）。本文认为中国目前主要面临的挑战包括：

（一）微观基础脆弱

规模导向，投资效率不高，经济微观基础相对脆弱。聚焦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可以发现中国企业更注重增加投资、扩大规模，而利润率却不高（刘俏，2018）。2018年中国有120家企业入榜《财富》世界500强，仅比美国少6家。虽然中国入榜企业数量在增加，但近期中美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差却有拉大趋势，从2000年的0.5个百分点拉大到2017年2个百分点以上。过去四十年的巨额投资造就了中国许多大型企业，其中一些已不幸成为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无法实现合理的投资收益率。中国企业快速崛起的背后，有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相对充裕的劳动供给、地方政府的做大培育、较低成本的技术模仿以及中国特色的制度原因等。中国经济的扩张一直以来依靠的是要素扩张，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对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需求极其旺盛，其微观企业表现为高投资率、低投资资本收益率的粗放发展模式。现在亟须转向低投资率、高投资资本收益率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这种转变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精心经营，还需要“好金融”的资金支持。

当然，中国企业大而不强也有其历史必然性。1993年以来增值税一直是中国第一大税种，而合并营业税后的增值税则更为庞大。由于1994年分税制后地方企业75%的增值税由中央分享^④，同时中央企业全部的增值税也归中央独享，所以中央政府有更大动力做大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规模；又由于营业税属于地方独享且具有重复纳税的性质，所以地方政府有更大动力做大地方企业的规模，尤其是可控性较高的地方国有企业。在企业发展模式上，当时中国企业主要是依靠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赶超发展，国家对知识产权也缺乏保护，所以中国企业没有动力通过自主创新来获取技术垄断利润。在要素供给方面，中国1963—1973年、1986—1991年的两次婴儿潮为其成年后的时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而中国居民过高的储蓄率又为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观的资本源泉，在大量劳动供给和大量资本供给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企业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扩大规模。总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国企业都有意无意中更倾向于扩大企业规模而不重视企业的利润实现。

我们认为经济微观基础脆弱只是阶段性问题，在中国发展模式的未来将会作为首要问题通过增长模式转型予以解决。首先，随着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政府对微观企业的干预性将会降低，由市场遴选出职业经理人，通过委托代理合同规范化的约束，进而实现可观的企业利润。其次，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充分利用国外市场，中国企业的资本配置可选集扩大，意味着实现更高的资本收益率成为可能。

^④ 2016年6月1日起，中央分享增值税的比例由75%改为50%。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高技术行业存在短板。在 2018 年《财富》世界 500 强中，中国有 9 家金属制品、7 家工程建筑、5 家房地产和 3 家舰船制造企业，而美国均为零；美国有 12 家生命健康、10 家食品生产加工、5 家制药和 3 家娱乐企业，而中国均为零。这表明中国的重工业、建筑业较强，而新兴产业较弱。在 IT 领域，中国仅有 11 家入榜，低于美国的 18 家，其平均销售收入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二，平均利润也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国家高新区作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国家高新区布局相对粗放，大约每 2 个城市就有 1 个，这还未包括省、市等非国家高新区。2018 年 1—5 月纳入统计的 156 个国家高新区净利润仅为 5.88%，略高于 2018 年入榜《财富》世界 500 强的中国企业（5.15%）。短期内跑马圈地式的同质化增长，造成了低端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并存、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等问题。而在全球产业链方面，中国高新产业在靠近终端消费者的下游产品竞争力较强，在上游核心材料和设备产业非常薄弱，尤其是芯片、面板、半导体、飞机发动机等领域严重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2018 年钢铁、水泥、光伏、平板玻璃、整车制造、建筑施工等行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各国选择扩大本国产品需求而缩小中国产品需求。二是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造成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三是由于过去关于公共产品的法律法规、政策不完善，高污染企业负外部性的排污行为虽已造成空气、河流等环境破坏，但并未受到社会应有的惩罚，使得该类企业的规模会超过社会最优规模；而随着中国人民对生活品质需求的提高以及相应法律法规、政策的完善，该类企业沦为产能过剩行业。四是产业政策的影响，比如国家对光伏产业的过度支持导致了如今光伏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导致了钢铁、水泥、建筑施工等相关行业的产能过剩等。

我们相信产业结构问题在未来将会有所化解。一是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政府利用市场工具，并辅以倾向性组合政策，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产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转移，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短板的补齐以及过剩产能产业的瘦身。二是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吸收国外前沿技术，培育本国高技术行业；同时，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会有效促进国际产能合作。

（三）贫富差距较大

2017 年中国收入最高的 20% 居民拥有 45.8% 的收入，超过德国、英国、法国（2015 年 39.7%、40.6%、40.9%），接近美国（2016 年 46.9%），而收入最低的 20% 居民仅拥有 4.2% 的收入，低于德国、英国、法国（2015 年 7.8%、7.5%、7.9%）和美国（2016 年 5.0%）。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处于高位^⑤，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之初，平均主义下的过度公平难以调动人民生产活动的积极性，提高效率迫在眉睫，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而中共十二大至十八大均对经济增长有相应的要求。直到十九大，中国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贫富差距问题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贫富差距作为较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是世界各国不得不面临的共同难题，尤其是在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的当今。美国的贫富差距之所以低于中国，是因为美国占据了全球产业价

^⑤ 2013—2017 年中国收入最高的 20% 的居民与最低的 20% 的居民收入比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情况不容乐观。

价值链高端，并将价值链低端转移到其他国家，进而使美国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庞大、低收入群体较小的较好局面。因此，我们对中国未来缩小贫富差距充满信心。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及时将价值链低端转移出去，并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完成低收入群体向中产阶级的良好转移，进而化解贫富差距问题。至于如何调整中国产业在价值链高中低端的布局，属于前面提到的产业结构问题。当然，中国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也能缩小贫富差距。比如，通过乡村振兴可缩小城乡间贫富差距；通过推动城镇化可改变城镇和乡村的人口权重，进而缩小总体贫富差距；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改变劳动报酬、资本报酬的分配比重，进而缩小提供劳动的人口和提供资本的人口间的贫富差距；通过发挥税收（累进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等）的调节作用可以缩小高财富人口和低财富人口间的贫富差距。

（四）资源配置不合理

在 2018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中，中国有 10 家银行入榜，其总利润高达 1760 亿美元，约占 111 家中国大陆入榜企业总利润的一半。但中国的银行业并不具有超高的经营水平，而是靠市场准入限制来维持垄断经营。本应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银行，却扮演着扭曲市场资源配置、阻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角色。一般情况下，资本应该从投资回报较低的领域流向投资回报较高的领域，但在中国却出现了“资本逆向流动”，资本并没有流向投资回报更高的非国有板块，而是流向了投资回报更低的国有板块。其根本原因是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表现为金融中介模式的长期滞后、国家金融中介体系的低效率、资源配置中的行政干预、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频频挥袖上阵（以城投为典型代表）、严格管制的生产要素市场等。因此，银行更偏好由政府做隐形担保的企业和投资项目。^⑥

我们认为资源配置扭曲只是阶段性问题。一是随着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政府将会降低对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和隐性干预；同时，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资源在微观企业中的配置将更加有效。二是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充分利用国外金融市场，中国的“资本逆向流动”现象将会消失，高效率的非国有板块将会获得国外融资。三是持续不断的制度创新，推动国内金融制度渐进改革，加之影子银行的崛起，这些都将促使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企业，从而降低资本扭曲程度。

（五）人口老龄化

过去中国奉行“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女逐渐进入育龄阶段，而这些育龄妇女正大幅缩减。即使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对其生育率有所刺激，仍无法扭转中国出生率下降的局面。我们基于 2015 年 1.55% 人口抽样调查，根据分年龄分性别死亡率、分年龄一般生育率、调查意愿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收敛性、出生人口性别比收敛性等信息并控制 2050 年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方位数值模拟了 2015—2050 年的中国人口结构。研究发现：受 1950—1958 年、1963—1973 年、1986—1991 年三次婴儿潮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交互影响，2015 年 15—64 岁有三个峰值，其中顶部峰值大约在 2025 年消失殆尽，最大的中间峰值大约在 2045 年消失殆尽，底部峰值在 2050 年也开始消失。再结合分年龄分性别劳动参与率以及延迟退休计划，我们发现 1995—2050 年中国经济活动总人口在 2014 年峰值（7.965 亿人）之后将出现下滑趋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在丧失。

^⑥ 银行的这种奇特偏好产生于利率的管制，由于存贷利差在不同类型的企业间并无太大差距，所以同等情况下资金会流向风险相对较低的国有板块（刘俏，2018）。

虽然数量上的中国人口红利正在丧失，但是质量上的中国人口红利正在不断累积，这或许是打开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把钥匙。根据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20 岁男性和 20 岁女性是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峰值，分别为 49.64%、58.16%。假定 20 年后的 2035 年依然保持此峰值，那么 2035 年 20—40 岁男性的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为 49.64%，20—40 岁女性的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为 58.16%。通过分年龄分性别计算，预计 2035 年中国大约有 3.2 亿人口接受过高等教育，而 2017 年的美国总人口才 3.26 亿人。也就是，中国未来的人口素质将会有很大的质量提升，这种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中国未来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基本吻合的，同时也是未来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的高素质人口后援力量。

总之，面对挑战，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高管都已认识到中国亟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和效率驱动，实现高质量增长。这需要改变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认知和思维定式，充分理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把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侧重放在寻找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解决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需克服的关键问题上。

五、中国发展模式的启示

中国的经济成功在于对政府与市场有效结合的不断探索，逐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政府的重要作用在于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营造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对有效的金融、能够顺利流动的劳动力等，再加上科学和知识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的不断增长，为经济和社会繁荣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机会。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通过统筹国内外市场，参与全球化产业分工，积极抢占价值链中高端，引进前沿科学技术和先进组织管理，中国经济能够迅速腾飞。但中国还需谨防被拖入全球化产业价值链低端，并不断增强国内市场对国际金融波动的免疫力。

参考文献：

1.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1 版。
2. 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经验与挑战（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N]，《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19 日 07 版。
3. 刘俏：《从大到伟大 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年第 1 版。
4. 徐宪平：《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 版。
5. 张军：《土地与增长：理解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J]，《复旦金融评论》2018 年第 1 期。
6.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M]，花千树出版社，2008 年第 1 版。
7.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
8. Brandt, L., Zhu, X., 2010,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D], Working Papers tecipa-394, University of Toront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9. Qian, Y., Roland, G.,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8, Iss.5: 1143-1162.
10. Zilibotti, F., 2017, "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15, No.5: 943-988.

(N)